

法国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程序简化但适用范围有限制

流落法国的各国文物何时“回家”?

“流浪”法国的文物有哪些?



科特迪瓦埃布里耶族圣鼓

原藏于巴黎布朗利博物馆, 2026年3月归还科特迪瓦

法国的博物馆共收藏大约9万件非洲文物,大多数为殖民时期非法掠夺所得。

最典型的劫掠文物是法国1892年入侵达荷美王国(今贝宁)时掠走的阿波美王官珍宝和塑像。此外,阿尔及利亚、马里、塞内加尔等非洲国家,均有数量不等的文物遭法国非法考古发掘与掠夺。

法国馆藏文物的另一大来源为亚洲,其中核心为中国文物,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从圆明园劫掠的青铜鎏金佛塔、景泰蓝麒麟、官窑瓷器、宫廷绘画等。

此外,阿富汗巴米扬石窟文物、柬埔寨吴哥窟石刻,来自越南、老挝、泰国的高棉文明和占婆文明文物,以及来自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的楔形文字泥板等也多被法国“不平等的考古发掘”劫掠。



《圆明园四十景图》(局部)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希腊雕像

《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

现藏于卢浮宫



19世纪,法国借非法考古发掘、强行收购等方式,攫取了大量古希腊雕塑、陶器、青铜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与雕塑,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巴洛克时期绘画及工艺品也曾遭到法国劫掠。殖民扩张期间,法国还掠夺了大量美洲原住民文物及太平洋岛国文物。

(制图:莫养菲)

本报记者 梁凡

当地时间5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标志着法国这一获得国际舆论广泛关注的立法行动走完了全部流程。虽然这部法律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所有非法流失在法国的外国文物将被自动归还,但法国此举仍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索回非法流失在法文物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实现和增强此类国际合作提供了范例。

简化归还程序而非自动归还

据新华社报道,法国参议院5月7日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并经国民议会表决全票通过。

根据法国此前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归还相关文物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新法案将建立一套制度化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把相关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届时归还事宜还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发布公告说,这项立法“旨在简化外国提出的归还请求处理程序”。她表示新的法律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附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一方面,法律草案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严格规范归还流程,即所有归还申请须经法国与追索国协商成立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并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等。

关于可归还文物的范围,新法案适用于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非法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1972年之后发生的文物掠夺或盗窃案件,只能通过民事法庭来解决。且新法案仅适用于外国政府的追索申请,还排除了军事用途文物和部分考古出土品。此外,法国政

府每年还应向议会提交报告,介绍其收到的外国追索请求及其处理进展等。

从上述规定中不难看出,新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相关文物会自动回归:首先,新法案并非规定“要归还”被掠夺来法的外国文物,而是从法律层面承认“可归还”;其次,新法主要是简化更新了“怎么还”的流程,而非直接取消流程、说还就还;最后,即使根据这一法案,也并非所有“被掠夺”来法的外国文物都能被归还,更不是“所有”在法外国文物都能被归还,不在法案规定时段内的、来源不清晰或不能被确认为“掠夺”的、历史上属于法军“军事战利品”的军事用途文物等,就不在新法适用范围。

部分中国文物看到“回家”希望

此前,该法草案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后,国民议会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发言时,提到了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将这‘不义之财’归还被掠夺的中国。”

1861年,在此前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并劫掠大量珍贵文物后,法国作家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在劫掠圆明园后,英法联军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所谓战利品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将送给她的圆明园文物汇集在一起,在枫丹白露皮埃尔大厦旧址底层建造了中国博物馆,将这些文物存放起来。

在西方博物馆中,枫丹白露宫收藏的圆明园珍宝最多,宫中的中国馆可以说是圆明园在西方的再现:馆中收藏文物1000余件,展出320件,全部是当年从圆明园抢掠去的。

有媒体分析认为,根据此次通过的新法案,目前收藏于枫丹白露宫的中国圆明园文物,完全符合1815年至1972年这一时段规

定、来源清晰(由侵华法军掠夺)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文物不属于所谓“军事用途文物”,因而有望按新法案的规定,未来以简化流程的形式归还中国。

不过,遗憾的是,还有更多流失在法国的中国珍贵文物,恐怕难以顺利借助新法案“回家”。例如,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长达100年的时间里,在战乱频仍的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盗窃、偷抢、非法买卖后走私倒卖到海外,其中就包括法国吉美博物馆所收藏的敦煌文物,这部分文物不仅追回难度仍然很大,甚至可能完全不知所踪。

文物归还难题仍然有待解决

放眼全球,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物数不胜数。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海外,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件中国文物,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中国的文物流失之痛,也是全世界很多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同遭际。然而,文物的追索与返还,一直是一个国际性难题。



2024年,意大利将56件文物艺术品归还中国。图为在意大利罗马,中意双方工作人员在文物装箱前检查核对。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保护文物、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陆续制定了一些国际公约,主要包括:《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议定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公约》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等。但是,它们仅适用于公约生效后被盗或非法出口的文物,对于公约生效前,尤其是近代通过战争、掠夺、胁迫等方式流失的大量文物,却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

好消息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在纠正历史不公、返还劫掠文物方面正形成越来越强的道德共识与行动合力,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不同层面开展文物返还实践。

例如,德国先后向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返还殖民时期掠夺的文物;荷兰将数百件殖民时期文物返还印尼、斯里兰卡等国;意大利多次向中国返还被盗文物,仅2024年就返还56件文物艺术品;美国向中国移交了包括子弹席帛书、38件明清藏传佛教文物在内的一批珍贵文化遗产等。

不过,总体来看,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前殖民国家长期以来归还掠夺文物进展缓慢,不仅有来自其国内各大博物馆的阻力,在法律和政治层面也缺乏强有力的依据。

近几年,法国一直在逐步推进文物和遗迹返还工作。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时公开承诺,将推动非洲文化遗产的归还进程,这也成为法国国民议会此次通过新法案的开端。2023年,法国先后出台两项法律,分别用于归还二战期间从犹太家庭掠夺的文物,以及归还公立馆藏中的外籍人类遗骸。2025年3月,法国正式将1916年从科特迪瓦夺走的埃布里耶族圣鼓“吉吉·阿约克韦”归还原国。

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赞赏法方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的责任担当,期待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也期待与法国在此领域开展合作。中法在防止文物走私、促进流失文物返还领域有多次成功合作实践。

有分析人士认为,法国此次的立法举动,不仅顺应了全球持续“去殖民化”浪潮的大背景,给其他西方前殖民国家“打个样”,也给“从对抗掠夺到文明合作”的时代潮流注入了积极动力。

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启动扩建项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当地时间5月11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4亿美元,预计2029年完工。

图为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左五)与肯尼亚总统鲁托(左四)出席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纪念牌揭幕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光 摄

日本经济遭受债务之困

毕振山

1343.84万亿日元,这是日本政府截至今年3月底最新的债务总额,这一数字,比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两倍还多。

根据日本财务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在这些债务中,国债总额为1207.2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6.7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达到1104.30万亿日元,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

日本政府的债务为何连年走高?这与日本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密切相关。

日本经济多年来增长乏力,为摆脱这一局面,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以大规模支出刺激增长。然而,增长缓慢意味着税收增加有限,为弥补支出缺口日本政府只能发行债券,这就导致债务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延续了对经济进行“大水漫灌”的做法,同时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而这些费用的来源,同样只能依靠政府举债。根据日本2026财年预算案,为弥补财政收支缺口,高市内阁拟新发国债29.6万亿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债务规模庞大,日本还陷入了以新债养旧债的局面。2026财年预算规模达到122.3万亿日元,其中用于偿还国债本息的国债费就达到31.3万亿日元,占了总额的约四分之一。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总额超过GDP的100%,这个国家就可能发生债务危机。而日本背负如此巨额债务却未破产,主要与日本国内的特殊情况有关。一方面,日本政府债务有大约一半都是日本央行持有,日本国内其他机构也持有相当份额,这意味着日本债务基本上是“自产自销”,避免因外部大规模抛售而崩盘。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使日本政府的借债成本被压到极低,还债压力不至于骤然上升。

不过,随着日本央行退出负利率政策并开始加息和减少购债,日本的债务问题逐渐凸显。美国和伊朗的冲突爆发后,由于日本对中东能源高度依赖,国际油价上涨引发日本通胀加剧。高市早苗的宽松货币政策则助推了物价上涨。日本政府如何处理通胀,关系到债务问题是否发酵。

根据日本央行4月底发布的展望报告,2026财年日本剔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将上涨2.8%,高于此前预期的1.9%,2026财年实际GDP增速则由此前预测的1.0%下调到0.5%。在通胀上升、日元贬值、增长放缓的预期下,日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面临艰难抉择。

如果日本央行选择收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从而抑制通胀,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抑制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加息将使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陡增。如果日本央行选择按兵不动,可能会使通胀加剧,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同样也会对经济增长不利。与此同时,通胀持续也将加剧日元贬值,增加日本的进口成本。

目前,高市已经采取了除加息之外的多项应对通胀措施,包括提供燃油补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等。为防止日元过度贬值,日本央行也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措施。然而有分析指出,日元贬值的主要原因是日美之间利差过大,加息才是稳定日元汇率的有效方式。不过在4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日本央行决定将政策利率维持在0.75%不变,即使加息也要等到6月下一次会议了。

日本的财政状况已经引发市场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就是表现之一。4月30日,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曾一度冲上2.535%,为近30年来高位。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在下跌,也将增加日本政府的还债成本。

不少专家认为,日本之所以陷入债务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在传统制造业衰落的情况下,日本经济缺乏足够创新和增长点。与此同时,少子老龄化意味着日本政府需要维持大规模社保支出,2026财年的社保预算占了总预算的近三分之一,加上不断创纪录的防卫费以及国债费,日本用于改善经济和民生的预算其实很有限。如果日本政府不能解决经济疲软问题,继续穷兵黩武,日本的财政状况很可能会继续恶化。



渔船边的中文课堂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芝林津区卡利巴鲁村,有一间开在渔船边的中文课堂。每个周末都会有几十个孩子聚在这里,跟着志愿者老师们学习中文。图为近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芝林津区卡利巴鲁村,志愿者老师梅英在水边的简易铁皮瓦棚给孩子们上中文课。

新华社记者 岑云鹏 摄

英国地方选举重塑国内政治格局

阅读提示

在近日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保守党同样表现低迷,改革党异军突起成为最大赢家。选举结果反映出英国政坛碎片化和极化趋势加剧。虽然斯塔默的位置在短期内尚难撼动,但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斯塔默政府未来执政将面临多重压力。

先,赢得129个议席中的58席,改革党和工党均获得17席,保守党仅保留住12席。

英国政坛碎片化和极化加剧

此次选举结果既是对英国政治现状的直观反映,也为未来英国政治发展勾画了前景。《金融时报》等媒体称其意味着英国政治进入“持久的政治转型”。

一方面,英国政治碎片化加剧。改革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的优秀表现与工党和保守党的惨败形成鲜明对比,英国政坛正由工党、保守党两党主导向多党竞争转变。

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将此次选举描述为“英国政治的历史性转变”,是“对英国政治的重塑”。绿党领袖扎克·波兰斯基则宣称两党政治时代“不仅在消亡,且已经死去”。

伴随碎片化趋势出现的还有选票的流动性增加。出现这一局面主要是由于工党政府上台并未兑现其重振英国经济的承诺,移民政策、人事任命都引发广泛争议。务实导向促使选民偏好根据议题及地方实际需求进行投票,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议题导向政党的兴起,而个性愈发淡漠的传统两大政党

则不再受到欢迎。

另一方面,英国政治极化趋势凸显。近年来工党与保守党在政策理念方面日渐趋同,选民对传统两大政党日渐失望,表现出强烈的变革情绪和挫败感,抗议性投票增多。改革党在2024年英国大选和2025年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亮眼,本次选举更是大获全胜,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选民对斯塔默政府移民政策的强烈不满。

与此同时,绿党也在积极争取不满于斯塔默政府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的青年选民,少数族裔和左翼选民。而在威尔士和苏格兰,民族主义政党依然受当地选民欢迎。

尽管以改革党为代表的极端政党崛起契合了近年来欧洲政治整体右转的趋势,但其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经验匮乏,这为英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增添了不确定性。

斯塔默政府面临多重压力

面对选举结果,斯塔默承认失利并承担相应责任,但坚称不会辞职,不会让国家陷入混乱。

目前斯塔默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不利局

面。在工党内部,已有多名议员公开表达对斯塔默执政能力的不满。已宣布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一职的埃卢妮德·摩根就指出工党政府需要反思其政策路线,工党需要重新成为“工薪阶层的政党”。然而,工党内部对于是向左翼倾斜以夺回被绿党抢走的选票,还是向右翼靠拢以回应选民在移民等议题上的强烈不满仍存在分歧。

在英国国内,斯塔默政府在经济与移民两大选民最为关注的议题上,表现均不及预期。一系列负面新闻也严重打击了斯塔默在2024年大选时塑造的值得信赖的危机管理者形象。近期多份民调数据显示,斯塔默在公众中的好感度和信任度均不甚乐观。

在对外关系中,英美两国在伊朗问题上分歧明显,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斯塔默,并指出英美特殊关系不似从前。英国与欧盟之间进一步深化贸易谈判,也面临诸多现实挑战。

考虑到工党目前在议会下院仍占有多数席位,斯塔默的位置在短期内尚难撼动。但在此次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和英国舆论都出现了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声音。不过预测下一届政府为时尚早。尽管近几次选举结果使改革党在2029年的表现备受期待,但其能否突破30%的支持率,仍取决于工党与保守党是否延续当前颓势,以及改革党自身在地方执政中的实际表现。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学院)



巩潇涵

5月7日,英国地方选举举行。此次选举共涉及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5013个席位,其中超过一半位于伦敦或英格兰东南部,另外还涉及6个直选市长职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改选。此次选举既是对斯塔默政府施政表现的一次“中期公投”,也是研判2029年大选前公众舆论的风向标。

工党惨败 改革党异军突起

在英格兰,工党遭到重挫,仅获1063席,较上届选举减少了1486席,丢掉多个关键地方议会的控制权,传统票仓失守。保守党也表现不佳,获得801席,不及自由民主党的844席。左翼绿党表现出色,获得了577席。此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极右翼改革党,共获得1453席以及14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在威尔士,工党长期占据优势,但在此次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远落后于威尔士民族党的43席和改革党的34席。这是工党104年来首次在地方选举中落败,也是27年来首次输掉当地议会选举。

在苏格兰,苏格兰民族党仍保持大幅领先